

歷史人物

物人史原

著 若 沫 郭

行 刊 店 書 海

1 9 4 9

序

我是有點歷史癖的人，但關於歷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較用過一些苦工，秦以後的我就不敢誇口了。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長，史料也實在太浩瀚，以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過關於秦以後的一些歷史人物，我倒作過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更簡單地說，主要是憑自己的好，因為出於惡，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裏面究竟比較少。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麼呢？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

我就在這人民本位的標準下邊從事研究，也從事創作。但在事實上有好些研究是作為創作的準備而出發的。我是很喜歡把歷史人物作為題材而從事創作的，或者寫成劇本，或者寫成小說。在幾篇短篇小說中，我處理過孔丘、孟軻、老聃、莊周、秦始皇、楚霸王、賈誼、司馬遷。在幾部歷史劇中，我處理過聶政與聶嬰，屈原，信陵君與如姬、高漸離等等。但有的創作流產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書裏面所收集的，如萬寶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我還有一篇釣魚城訪古，也是想把釣魚城的故事寫成史劇的調查工作。史劇沒

— 2 —
有寫成，那篇調查記，雖性質儘可以收在這兒，但已經被收進今昔蒲劍裏面去了。

我對於王安石是懷抱着一種崇敬的念頭的，實際上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在中國歷史上很難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見，有魄力，而最難得的是他是以人民爲本位的人。他在歷史上出現得太早了，孤立無輔，形成了一個屈原以來的大悲劇。這悲劇不限於他晚年的失意，而是在他的新政廢止之後，宋室卒於遭到異民族的顛覆，中國的農民老是不不得翻身，又苦了一千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三個人拿來寫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識，司馬光代表地主階層，蘇軾作爲游移於兩端的無定見的浪漫文人。這些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主觀見解，他們三個人，在當時實在是代表着這樣的三方面。以司馬光爲代表，漫衍而爲南北兩宋及其後的道學家，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打着儒家的招牌，吃的是孔孟的殘飯，實際上他們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壞的一些齷齪，和道家的精神結合了。那些鼎戴着司馬光的所謂大儒，周程朱張，認真說只是一些道士。在秦漢以後要找一位純正的儒家代表，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

王安石被埋沒了一千年，近代人漸漸知道他的價值了。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佔的地位，就在我們新與歷史家的頭腦裏似乎都還抵不過司馬君實和周程朱張。一種傳統觀念一被形成，要打破實在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

三人行沒有寫成，王安石的研究，在本書所收的實在只是一點輪廓。關於他，我在重慶時曾經作過幾次講演，自己覺得講得也還不錯，然而紀錄得實在太簡單了。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不過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詳細的文字，只消舉出他的兩句話已就足供我們受用。

一、「某自諸子百家，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頂重要的就是這「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這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向老百姓學習」嗎？

二、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摧制兼併，均濟貧乏。」這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打倒土豪劣紳，使耕者有其田嗎？

關於王陽明的一篇已經是二十六年前的東西了，收在這兒實在有點不倫不類，或許還會使少數的朋友感到惶惑。那本是為當時泰東書局版的王陽明全集所作的一篇序，其後曾經收進文藝論集的初版，在改版時，我自己又把它刪掉了。但我今天依然把它收集在這兒，一以表示我自己的思想發展過程，又一想在這兒替王陽明說幾句公平的話。

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經歷過好幾度的變遷來的。我信奉過汎神論，甚至實際從事過靜坐，因而王陽

明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個時期是最崇拜的一個人。今天拿思想的方法來說，他無疑是一位唯心論者，但我也不能學當今的賢者那樣，凡是有唯心論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爲反革命。其實評價一個人的思想應該在整個的思想史中尋求它的真實的時代意義。唯心論有時候並不比唯物論更反乎進化，或違背真理。歷史是採取着辨證式的發展的，在唯物論流而爲瑣碎，鋼沒性靈的時候，每每有唯心論起來加以挽救。在這樣的變革時期，我們本着矯枉不妨過正的觀點，無寧是應該讚揚唯心論的革命性的。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無疑是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瑣碎，想脫去一切學枷智鎖，而恢復精神的獨立自主性，這無寧是值得我們讚美的。我們不要在他所說的「致良知」的一些曖昧的形而上的言語上去拘泥，我們請在他的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鍊」上去做工夫吧。說明了這些，我敢於坦白地承認，我在今天依然是敬仰着王陽明的。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爲我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特別是以仕宦子弟的舉人而參加並組織了革命的李巖，這明明是帝王思想與人民思想的鬭爭，而這鬭爭我們還沒有十分普遍而澈底地展開。

關於李巖，我們對於他的重要性實在還敘述得不够。可惜關於他的資料是毀滅了，我們可以堅決地

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懷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須知他是主張「均田」的。唯其這樣，所以他能够與李自成合夥，他的參加農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並不是單純的「官激民變」。

認識了李巖的這層重要性，我們請把他和約略同時的一些學者或思想家來比較一下吧。例如顧炎武在前是被視為承先啓後的一大鴻儒，特別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滿清的羈縻，而且還有組織地下運動的傳說。但他對於李自成是反對的，可以證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無人民思想。

又例如王船山，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來是够被強調着，駸駸乎駕諸顧炎武之上了。他的民族思想也異常強烈，曾參加南明的抗清鬪爭，明亡隱於苗洞，堅苦著書，書也到了兩百年後才爲曾國藩所刊行。這些往事的確是可以增加人對於他的崇敬的。然而在我看來，他也只富於民族氣節而貧於人民思想。

這兒有這麼一段事實：張獻忠到了湖南，慕王船山的大名，特別禮聘他，請他參加他的隊伍。王船山躲起來了，不肯和草寇合流。張獻忠使用綁票的方式把船山的父親捉了來，要挾他，弄得船山沒法，只好毀傷自己，被肩輿抬着去見張獻忠，張獻忠看他那樣固執，便把他父子一同放了。據這個故事看來，我們可以了解張獻忠也並不如一般傳說所講的那麼胡塗，而王船山的固執倒是可以驚人的。請把這種態度和李巖比較一下怎樣呢？李巖不是可以更令人向往的嗎？

我本來想把李巖寫成劇本的，但沒有成功。已經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寫成劇本了，可以省得

我費事。不過我還有一種希望，我們應該把注意力的焦點，多放在李巖的悲劇上。這個人我們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兒的讀書人，而是應該把他看成為人民思想的體驗者、實踐者。雖然關於他的資料已經遭了湮滅，在思想史上也應該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目次

| | |
|-----------------|----|
| 序····· | 一 |
| 論曹植····· | 一 |
| 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 | 三〇 |
| 王安石····· | 六 |
| 王陽明····· | 七 |
| 甲申三百年祭····· | 九 |
| 附錄：關於李巖 | |
| 夏完淳····· | 三〇 |
| 王國維與魯迅····· | 一六 |
| 論郁達夫····· | 一七 |
| 論聞一多做學問的態度····· | 一八 |

論曹植

曹植在中國文學史上曾獲得極豪華的聲名，這在我自己認為是一件不十分可以了解的事。

譬如鍾嶸的詩品把他列於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於中品，把他的父親魏武帝曹操列於下品，便是最見軒輊的一種見解。這樣分明的不公平是遭了後人的非議的。雖然也有人替鍾嶸辯護，說他的上中下只在表明淵源，並非流品的等級，但在原書的評語辭氣中雖然有天淵之別。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字子建，曾封平原侯，臨菑侯，雍丘王，東阿王，陳王，死諡思，故又稱陳思王，曹操之第四子。

●鍾嶸（？——五五二）字仲偉，潁川人，生於宋末，歷任齊、梁、梁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曾引爲寧朔記室，專司文翰，故復稱爲鍾記室，卒於梁元帝承聖元年。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字子桓，曹操第二子，因長子昂（字子修）早陣亡，故得嗣立，卒諡文。

●曹操（一五五——二〇〇）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由孝廉積功至丞相，掃蕩羣雄，權傾漢室，曹不受禪後，追稱爲武帝。

「檀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猶人倫之有鬪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撫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

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這無論如何應該可以說是最高的讚詞。而關於魏文帝呢，則只說：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餘篇，率皆鄙直如偶語；「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玩，

● 劉楨（？——二一七）字公幹，東平人。

● 張協（二六五——三一五）字景陽，安平人。

潘岳（二四〇？——三〇〇？）字安仁，中牟人。

陸機（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人。又與其弟雲並稱為二陸。

● 李陵，漢武帝時名將，後降匈奴，與蘇武答和詩，相傳為五言之祖，但經近人研究，實為偽託。

● 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字仲宣，山陽高平人。

● 「所計」二字或作「新奇」，注者多以上句「則」字連下讀，頗覺不適。魏志文帝紀「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勅成垂百篇」即此所云云也。

● 西北有浮雲，乃雜詩第二首，其全文云：「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故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長人。」

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銜羣彥，對揚厥弟耶？」

這樣比較起來，還不足以表現出鍾嶸心目中的優劣感嗎？下品中的魏武帝，更真是每況愈下：「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僅僅這樣的十個字而已。

鍾嶸歷仕齊梁，在當時正是文尚駢麗，詩重聲律，南朝的文人極端從事藻飾的時代。鍾嶸自己雖然頗重「自然英旨」，能道出「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語，但他究未能脫離時代的影響，而獨於推崇曹氏父子中偏重藻飾的曹植，這正表示着他自己的主張的不澈底，而時代的力量終竟是強大。被他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潛也被列於中品，而淡淡地敘述了事，不又是一個明證嗎？

但推崇曹植亦不始於鍾嶸，和他同時而著述略早的劉彥和●在他的文心雕龍裏已把這種見解認為「舊談」了。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饒，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辨要，選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見才略篇)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晚年為僧，更名慧地，在梁曾歷任微職，有劉舍人之稱者，以曾任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也。文心雕龍時序篇有「皇齊御宇」云云，可知其書作於齊代。

彥和的見解比鍾嶸要公平得多。抑丕揚植，竟至「相去千里」，在彥和時已屬「舊談」，可知鍾嶸的論調也不過是對於「俗情」表示了「雷同一響」而已。後人因為崇拜曹植之極，也有運彥和一並加以斥罵的，如丁晏●曹集詮評集裏面，引了上列「才略」一節即加以案語道：

「子建忠君愛國，立德立言，即文才風骨，亦非子桓所及，舊說謂「去植千里」，真「篤論」也。彥和以丕植並稱，此文士識見之陋。」

在「文才風骨」之外，又抬出了「忠君愛國」的長生祿位牌來，這樣一來，曹植簡直就成了真正的周公孔子了。丁晏的崇拜可以說是比鍾嶸更進了一大步。

丁晏的曹集詮評，在苦心校勘，蒐羅子建遺文，使之匯結成集的一點上，的確是有益的良書。但他是生在前清中葉，一直活到同治年間的人，在受了滿洲人的超級奴化教育二百餘年的學術界中，他要標榜忠愛，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他的見解也有淵源，淵源之所自，當遠溯於隋代的王通：

●丁晏字儉卿，山陽人，毓生於乾隆末年，所著曹集詮評，乃得曾國藩之助而刊行於同治年間，時丁尚存，享年在七十以上，此書商務印書館有鉛印本，頗易得，末附曹子建年譜，於研究上頗爲便利。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居河汾教授，從業者千餘，魏徵即出其門。卒後，門人私謚文中子。

「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文中子事君篇）

「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同上）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污其跡，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同，魏相篇）

王通的文，中子本有僞托的嫌疑，但不管是真是僞，對於曹植的這樣看法總得遠溯之於唐初，而明代的李夢陽也，也就盡量的發揮了這種意思。李說見曹集舊序，稱其「縱酒蹈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而比之以秦扶蘇與季札。張溥題辭，惋惜之極，對於他的風流韻事，也盡力平反，謂「黃初二令，曹憲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又謂「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竟又把 he 比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姬昌了。丁晏要在

●李夢陽（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字天賜，更字獻吉，慶陽人，為明弘治正德間所謂「七子」之領袖。其曹集舊序見詮評所引，丁晏甚稱之，謂為「北地第一篇文字。」其實意見頗迂腐，文中亦引及王通「以天下讓」之語。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為明末復社之領袖，號西銘先生，著述甚富。

●曹集中有黃初五年及六年令，唯前令與悔過無涉，別有「寫灌均上事令」亦作於黃初年間。灌均者，魏志本傳稱「黃初二年監關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曹植因以獲譴者也。

道德方面盡力爲陳思王粉飾洗刷，其實也就蹈襲了王李張諸人的唾遺。然而，這些論調，總不免有點迂腐的。

曹植在幼年的時候大概是一位「神童」，故「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十九歲便能做銅雀臺賦，雖然並不怎麼偉觀，但年未入冠而能下筆成章，自屬難能可貴。所以世說新語說是「世目爲繡虎」，文心雕龍稱之「援牘如口誦。」這樣自然得到他父親的歡心，於是便很想立他爲太子。但後來終竟失了寵。魏志陳思王傳說得很明白：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飭，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

這一方面固然表示着魏文帝比他的弟弟終竟高明，而陳思王這位「神童」實在有些恃才傲物，並恃寵驕縱。他曾擅開司馬門私出，最傷了他父親的心。楊修爲魏武帝主簿（如今之祕書）與植暗通關節，「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故文帝是怎樣「御之以術」我們不得而知。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時，曹操遣植往救，「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本傳僅言醉，不言如何醉。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祖護曹植的人便據此對於曹不大事聲討，「以天下讓」的諛辭也就是從這兒產生出來的。

其實平心而論，不之飲餞遍醉，未必出於有心，因為臨行之前要被召見，不於事前未必知道。即使認爲有心，但植並不是婦人女子或不曉事的孩童，何至於一逼便醉？即使認爲這就是文帝用詐術，但曹植與楊修的暗通關節以爭求父寵，又何嘗不是用術？不僅兄弟之間未能相待以誠，即父子之間亦實際相欺以詐，這何嘗是有心韜晦，「以天下讓」的人呢？

曹植在初年恃寵驕縱，我看是毫無問題的。魏志裴注引典略，也明明說他「以驕縱見疎」。這正是他的性情。他的爲人十分誇大而自視甚高，同時又把別人不十分看進眼裏，我們看他與吳季重（質）書上的那些話吧：

「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水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重，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這在現代式的文人或許會讚爲寫得淋漓盡致。但這樣誑誕饕餮的誇張，不僅是毫無美感，簡直是大殺風景。這不是他「任性而……飲酒不節」的自畫的供狀嗎？我們還應該想想，他所處的究竟是什麼時代。豈不是兵禍連年，癘疫猛惡，千里蕭條，人民塗炭的時候嗎？雖然只是想像，而他公然竟能有這樣的誇大的想像：這位「三河少年」，真正是豪哉華哉了！

●敖陶孫詩評稱：「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爲三河少年，風流自賞。」